



跨湖桥文化研究

蒋乐平 著



 科学出版社



跨湖桥文化研究

蒋乐平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跨湖桥文化是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文化面貌新颖独特,由于其年代古老,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关系不明晰,考古学界一度为之迷茫,产生了认识上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及其消解,具备重要的学术分析价值。跨湖桥文化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在新发现基础上完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研究的重要案例。全书内容分十章,第一至第八章分别就跨湖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跨湖桥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跨湖桥文化的器物以及生业方式、跨湖桥文化的聚落形态与精神生活、跨湖桥文化的分期及年代、跨湖桥文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阐述与探讨。第九章重新梳理了“跨湖桥视角”下的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第十章的探讨衍伸至洪水神话的内涵及本质,指出海侵导致的跨湖桥文化覆亡可能是中国版洪水神话的源头之一。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考古、历史地理特别是史前考古的研究者及相关院校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湖桥文化研究 / 蒋乐平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03-041861-6

I. ①跨… II. ①蒋… III. ①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87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603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6

字数: 310 000

定价: 1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辉忠 李 强 黄坤明

茅临生 郑继伟 金德水

委 员：陈德荣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陈昆忠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蒋承勇

梅新林 许 江 张金如 李卫宁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陈铁雄 卢子跃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邵正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

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目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

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

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序 言

陈星灿

《跨湖桥文化研究》是乐平花费很多心血写的一部书。他写完之后将稿子寄给我，要我提意见，写序言。我除了在乐平发掘的跨湖桥、上山和荷花山以及浙江其他同事发掘的小黄山、河姆渡、田螺山、马家浜、良渚、方家洲等遗址参观学习之外，并没有做过实际的田野工作，因此只能提些不关痛痒的意见。但我很高兴把老同学写的这部书稿仔细读完。在这百花斗艳的春日，它不仅把我带到了令人神往的跨湖桥文化，也把我带到了钱塘江两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去。

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虽然发现不晚，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也还只有吴兴钱山漾、杭县良渚和杭州老和山（当时称为古荡）寥寥几处遗址。发现不久，因其与中原龙山文化面貌相似，梁思永先生即把这些发现纳入龙山文化系统中，称之为“杭州湾区的龙山文化”。尽管大家知道这种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陶鬲发现不多，也不是标准龙山文化的形式；三角形的石刀只在该地区发现，而不见于其他地区；有段的石铤、石凿，表示它和东南沿海如福建和台湾等地的特殊关系，但一般认为它是中原龙山文化向南发展的结果，年代自然比龙山文化要晚。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一文中，虽然明确这种遗存为良渚文化，但又指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考古》1960年第2期第1页）。在1965年发表的《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一文里，夏鼐先生又说：“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有点像山东龙山文化，可能是受它的影响，年代大约也稍迟，可能相当于中原的殷商时代。它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人民日报》1965年4月7日第3版）直到河姆渡文化发现之后，因得益于碳-14年代测定数据的陆续公布，我们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认识才发生了质的变化。1977年，夏鼐先生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肯定河姆渡四层和西安半坡五层碳测数据的可靠性，认为“这两处应该是现在能确定的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了”。他还说：它们“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是相同的，都是以比较原始的农业为主，也兼从事于渔猎和采集工作，还饲养家畜。但是文化类型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当然这

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相互联系，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将一切都归之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这十几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碳-14测定年代的结果，似乎是支持我的这种看法。”（《考古》1977年第4期第221页）在同一篇文章中，夏鼐先生不仅肯定了“河姆渡文化”的命名，指出这种下层文化是“前所未见”的，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还强调，它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农具是骨耜，家畜是猪、狗，可能还有水牛。有使用榫卯的木构建筑。陶器是夹炭末的黑陶，造型简单，主要是釜、钵、盆、盘等五种，有类似鼎足的活动支座，但是没有鼎、豆等。到这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土著性，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长江下游地区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时或开始稍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第387页）。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国文化摇篮的认识，于此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

不过，在河姆渡文化发现之后，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被冠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首，列在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之前，但它更被视作宁绍平原地区的一支土著文化，与杭嘉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南北并峙，河姆渡文化的来源、内涵、发展和去向都是学术界长期讨论并悬而未决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宁绍平原发现良渚文化层，浙江的同事们先后发掘了绍兴马鞍、宁波江北慈湖、奉化名山后和象山塔山遗址，普遍发现鱼鳍形和“T”字形鼎足、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泥质黑皮陶双鼻壶、泥质黑皮陶带流阔把杯等良渚文化因素，虽然大家对这种遗存的性质和命名认识不一，但都承认它跟杭嘉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关系密切，有的甚至径直命名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或认为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黄宣佩：《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的探讨》，《文物》1998年第2期），证明钱塘江两侧的史前文化重新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在宁绍平原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主持塔山遗址发掘的乐平曾敏锐地提出，这或许是马家浜文化居民南迁的结果，这种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河姆渡文化第三期发生质变。在他看来，这个第三期实在是“河姆渡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接受北部马家浜文化影响的产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65页）。这个意见虽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但多少打破了浙江史前文化划钱塘江而治的刻板印象。钱塘江南北两岸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最近陆续公布的考古材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跨湖桥文化的发现，翻开了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新的一页。虽然发现之初，对其年代和文化性质不乏质疑之声，但我们现在知道，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分布于钱塘江中下游地区，虽然采集和渔猎还是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但农业初步成熟，以家畜饲养为特征的定居农业生活也已经开始。制陶、独木舟和漆器制造、榫卯建筑技术的使用是该阶段重要的文化成就。与新世纪发现的上山文化相比，跨湖桥文化居民的生活区域明显从山区向河口平原转移。用乐平的话说，跨湖桥居民是沿海平原型文化的开拓者。

跟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密切相关，乐平拟构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体系（参见本书第八章及蒋乐平：《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简单说来，就是他试图超越钱塘江的地理阻碍，将“钱塘江”和“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理解为区域文化连续体的四个阶段，动态把握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第一阶段，是“钱塘江期”。该阶段以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为代表，是本土文化势力统治时期。第二阶段，可名之为“杭州湾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的早期，约距今7000年至6200年。第三阶段，可名之为“太湖期”，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约距今6200年至4400年，钱塘江南北基本进入相对统一的文化发展阶段。第四阶段，被称为“回归期”，即钱山漾文化阶段，也可以将马桥文化包括在内。在第二个阶段，河姆渡文化是本土文化——跨湖桥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与此同时，更多具有北方元素的马家浜文化在太湖流域形成，在与河姆渡文化的对峙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在乐平看来，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是以跨湖桥文化为基础，在北方史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诞生出来的孪生型的两种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是，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本地传统保持得更多些。绳纹陶釜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顽强保存下来，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更丰富也更复杂，并对后来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向性意义。到了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太湖地区文化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人口陡增，其分布区域也向钱塘江以南地区扩张，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也被纳入其版图，但该地区依然保持某种程度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解释，显然突破了浙江史前文化以钱塘江为分界的二元对立发展的思考模式。

这些新思考，多少是跟跨湖桥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相关联的。总之，跨湖桥文化的新发现，为我们讨论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发展和谱系，揭开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鲜材料，至今犹在冲击着我们的认知能力。它源自何处？和新世纪发现的更古老的上山文化是什么关系？跟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更遥远的同

时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居民是怎样生活的？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使用什么样的陶器、骨器和木器？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又是如何走向衰落的？他们的农业是什么样的？狩猎采集又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精神生活如何？凡此等等，乐平在书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和分析。上面有关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脉络的简述，其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跨湖桥文化的深入研究，虽然得益于跨湖桥遗址地下埋藏环境的优越，使许多有机物得以保存，但更有赖乐平和他的研究团队对该文化的长期深入研究。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报告已经出版，现在乐平的跨湖桥文化综合研究著作也要面世，我有幸先睹为快，写几句话，以志祝贺，并把这部书推荐给各位读者。

2014年4月14日

目 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习近平) (i)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v)
序言·····	(陈星灿) (vii)
绪论·····	(1)
第一章 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10)
第一节 跨湖桥遗址的发现·····	(10)
第二节 跨湖桥遗址年代的争议·····	(13)
第三节 跨湖桥文化的提出·····	(19)
第四节 跨湖桥文化概念的完善·····	(20)
第二章 跨湖桥文化的自然环境·····	(23)
第一节 全新世的钱塘江·····	(23)
第二节 动物群、植被、气候·····	(27)
第三章 跨湖桥文化器物·····	(33)
第一节 陶器·····	(33)
第二节 石器·····	(54)
第三节 骨(角)器·····	(60)
第四节 木(竹)器·····	(66)
第五节 弓、漆和黏合剂·····	(75)
第六节 东亚最早的独木舟·····	(80)
第四章 跨湖桥文化的生业方式·····	(90)
第一节 稻作农业·····	(90)
第二节 采集、渔猎和动物的驯养·····	(99)
第三节 原始的纺织·····	(116)
第四节 “中药罐”与原始医术·····	(122)
第五节 索取与开拓——海洋的方向·····	(124)
第五章 跨湖桥文化的聚落形态与精神生活·····	(131)
第一节 聚落的模式·····	(131)
第二节 太阳纹与太阳崇拜·····	(142)

第三节	“火”的祭祀·····	(149)
第四节	神奇的“数卦”·····	(150)
第六章	跨湖桥文化的分区、分期和年代·····	(159)
第一节	新发现的跨湖桥文化遗址·····	(159)
第二节	分区和类型·····	(169)
第三节	陶器演变和文化分期·····	(173)
第四节	年代·····	(177)
第七章	跨湖桥文化的来源·····	(186)
第一节	直接源头：上山文化·····	(186)
第二节	与江、淮、河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	(191)
第三节	8000年前的格局：中国南方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	(206)
第八章	跨湖桥文化的衰落及去向·····	(213)
第一节	衰落之谜：干旱·····	(213)
第二节	衰落之谜：海侵·····	(214)
第三节	去向之谜：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	(217)
第四节	去向之谜：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230)
第九章	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新谱系·····	(235)
第一节	“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再认识·····	(235)
第二节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新谱系·····	(240)
第十章	跨湖桥的倒影：记忆变形与洪水神话·····	(242)
第一节	神话中的“洪水”·····	(242)
第二节	历史化的“洪水”·····	(244)
第三节	科学语境与被荡涤的记忆·····	(247)
后记	·····	(251)

绪 论

一

第一次关注跨湖桥遗址，大约是1990年的11月，那时我正在象山发掘塔山遗址。传来的消息是，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彩陶，心里暗暗吃惊。彩陶？这可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符号！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第一次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不太相信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明现象，引来一桩“彩陶文化西来说”的学术公案。自此，即如夏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辉煌历史不能撼动的标志，“彩陶”也成为黄河文明被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的一扇重要的窗口，被披上了神秘而神圣的色彩。尽管史前考古早已为长江流域摘除了“荒蛮落后”的帽子，改写了东南边陲的上古史，但北望汤武周公圣地，不免觉得脚下这块土地的浅薄。与仰韶彩陶的绚丽多姿相比，河姆渡的陶釜、陶罐、陶支架，显得多么的灰蒙暗淡啊！它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从学术的角度，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洪荒未凿；从情感的角度，不如说是希望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以三代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缔造有更直接的联系。那么，彩陶，从钱塘江的转弯处破土而出的彩陶，是为了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吗？

这是我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感想。当时大学毕业没几年，学识幼稚，对考古充满想象。一年过去，进一步的消息是，跨湖桥遗址的¹⁴C测年数据超过8000年，比河姆渡遗址更早，但文化面貌与河姆渡文化缺少联系，陶器工艺上甚至表现出先进的一面。一时间，或惊或疑，议论纷纷。其时我已见识过跨湖桥遗址的一些出土遗物，思绪依然交集在其中的彩陶上。那太阳纹的光焰，在时空的深邃处幻化为暗夜中闪烁的星辰，一颗，又一颗，半坡的、庙底沟的、大汶口的、马家窑的……我无从参与讨论，说实在的，内心只有对遗址发掘者的艳羡。没想到，10年以后，我有幸亲自发掘这个神奇的遗址。

事情还得从塔山遗址的发掘说起。塔山遗址下层发现一个距今约6000年的氏族墓地。根据墓葬的朝向、随葬品的特征，我将这个墓地分为两个组别，一组代表河姆渡文化传统，另一组代表马家浜文化传统，反映的是这两种文化在象山半岛历史某一时刻的相持相融状态。从主观上说，这样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打破钱

塘江—杭州湾对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机械分割。浙江考古界占主导的认识是，杭嘉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属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宁绍地区则是河姆渡文化体系。尽管大家都认识到河姆渡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明显的马家浜、崧泽文化因素，也已经发现河姆渡文化的后续依然是良渚文化，但囿于这种划分所附带的逻辑关系，总是不能名正言顺地将这层关系理清楚，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演变过程难以与河姆渡—良渚文化的演变过程相兼容。这种表面上的逻辑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很显然，考古学文化概念偏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内容，“文化融合”“相互影响”这些词汇重复多次后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我们果真能够以“约定俗成”的态度轻率地对待严肃的学术问题吗？塔山下层墓地的分组、或者说分组的目的，是试图说明在距今6000年之际的象山半岛，有两个人群几乎同时到达，并定居下来，他们在葬俗上各自秉持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传统，但又和谐地共同居住一个村落、享用一个墓地。这种社会结构的真实情形已经无从晓知，但得出的结论很简单，那就是马家浜文化以人口迁居的方式，跨过钱塘江，与河姆渡文化的后裔共同开创了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历史的崭新篇章。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距今6000年后宁绍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密度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张，说明人口的增加带来了这一地区土地开发的新速度。这样，就将“影响”“融合”等抽象的描述性用词，转化成了具体而生动的考古学事实，从而抓住了宁绍史前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距今约6000年这一时间概念被赋予了实在的历史内容，以此为界，前段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后段，钱塘江两岸已进入了共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可以纳入马家浜文化的范畴，或者也可以以一个地方类型——塔山文化类型名之，但共同驶向良渚文化的历史航向已经确定——这是我从事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个学术观点，这个观点或许也只能算是旧瓶装新酒，发表后并没有产生多少反响^①。现在看来，论述方式也略嫌单薄，比如，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能够简单地用马家浜文化的南侵作解释吗？背后是否存在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因？但对我来说，这一己之得已经足够重要，它帮助我卸除了身上泛河姆渡文化的沉重包袱，将河姆渡文化的分布概念与宁绍地区（或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地理概念切割开来，使我能够轻松和包容地看待不同遗址中的陌生因素，并积极地去发现和探究这些陌生因素中的历史意义。

1996年，我与跨湖桥遗址走近了第一步。这一年，在配合杭金衢高速公路建设的考古调查中，我和我的同事黎毓馨在萧山博物馆倪秉璋先生的带领下发现了

^① 蒋乐平：《塔山下层墓地与塔山文化》，《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